

周扬文艺思想民族性与文学创作

韩立平 (国家开放大学 100039)

摘要: 对于周扬文艺思想民族性的研究不仅是对周扬文艺思想的研究,更是为了让这一理论思想更好地发挥其理论价值。周扬在“十七年”时期讨论“民族性”问题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以人民群众为创作立场关注的比较多。

关键词: 周扬; 民族性;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人民群众

周扬文艺思想民族性作为20世纪重要的文艺理论命题,这一理论思想是中国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以人民群众为创作立场这两个角度来论述一下“十七年”时期周扬文艺思想中的民族性对文学创作影响。

一、丰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对遗产的整理和研究是一件必要的继承工作,许多古典的和民间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是具有重要的学习和借鉴价值。在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中,现实主义传统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从《诗经》开始追溯。因此,对于民族遗产文化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他们勇于揭露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

1942年,毛泽东就曾提出要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像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等大家都朝着这个方向做出过努力。周扬是最早系统并完整地介绍与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周扬在1938年《抗战时期的文学》一文中曾提到过。尤其是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进一步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对于发展文艺的民族传统就显得更为迫切和具有重要意义了。

1951年周扬在《从〈龙须沟〉学习什么?》一文中就说到了要学习老舍那种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老舍在创作的时候非常熟悉自己要创作的人物,并通过他超强的语言能力表达出来,其作品的人物是活生生的,真实的。中国文学艺术不仅在现实生活与斗争中产生,还需要学习和继承文学艺术遗产中的优良传统,并将这些传统与现实的任务结合起来,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同时,周扬还认为:“判断一个作品是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不在它所描写的内容是否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而是在于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的真实。”¹这正说明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有区别的,树立社会主义的观点和立场是很关键的。我们不能笼统的说写现实的生活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而是在描写这样的生活的时候,是否使用了社会主义的观点和立场,我们使用这样的观点和立场描写农民、工人和人民解放军,这些人就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工农兵了,而是具有先锋队的意义在里面。尤其是我们国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之后,我们的工农兵以及知识分子都在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努力,这些都是文学艺术上发展的现实基础。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传统是促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重要部分,我们知

道中国几千年下来的文学艺术遗产中有许多的现实主义作品,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红楼梦》,就深刻地描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史和其中人物的斗争。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古典文学艺术作品都是这样,反观这些作品都是充分地学习和继承了民族文化传统。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时不可忽视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传统,也只有这样的文学艺术才是人民群众的。

1953年,周扬在第一届全国电影剧作会议上又谈到了这个问题,认为我国的电影剧作的水平可以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作为标准,这个标准需要以中国的现状、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状况和中国的民族文学艺术的传统作为出发点,不然谈的一切都是空洞而无实际意义的。因此,只有和文学艺术传统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作品才可能具备民族的形式、色彩和风格。因此,作为一名有着民族传统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家,必然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其创作的方法,并将其作为文学艺术批评与评论的最高准则。这里就说清楚了两件事情。第一,几千年来所传承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值得学习和继承的,但是要注意一点,它是没有社会主义这一特点的,只是忠实地反映真实的生活,这也正说明了周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理解是有区别的。因此,周扬在“十七年”时期通过文学艺术的民族性来学习和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正确的。第二,要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利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十七年”时期是周扬文艺思想民族性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阶段。此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都迎来了新的发展,也需要新的文学艺术来反映,但是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是不可丢弃的,这也是对我们长期以来崇洋媚外思想的冲击。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人类艺术发展的新方向,作为一种进步的创作方法,才能更好地在继承民族传统和批判接受外来形式的时候,破除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问题。在坚持发挥具有民族性的传统基础上,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现实和斗争进行深刻的理解,允许不同风格和不同流派的存在,才能使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得到更大的繁荣发展。同时也要看到,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改造和深化,将其与“文艺大众化”“典型论”相结合,使其“苏氏色彩”大大减弱,使该创作方法真正地融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中去。

虽然在1960年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一文中,周扬认为“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批判地继承和综合了过去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²,但是必须明白,这是周扬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将两者相结合,形成一种将革命浪漫主义作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补充发展并宣传的新艺术方法,这才是周扬内心真正的理论认识。这种“两结合”方法按照周扬的理解,其实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中国式说法。

二、坚持为人民群众的创作立场

中国的文学艺术不仅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而且与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密切联系着。因为这些作品是劳动人民群众或人民的文学家、艺术家所创作的。这些作品不但表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且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以及意志愿望，是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如果一个文学家和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只会闭门造车，而不想着怎么努力去熟悉人民群众的生活，用自己创作的作品去教育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这样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必然会被人民群众所排斥，被时代所淘汰。

关于文学艺术如何普及和提高问题一直为文学艺术家所关注，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把其当成一项文化事业来建设。所谓的普及就是要使群众有读物，要使群众有合适的读物。文学艺术家不是根据自身的意愿随意创作的，而要根据社会的需求和人民群众的需要而进行创作，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去。忽视人民群众的兴趣和爱好，这正是缺乏群众观点的表现。同时也要正确地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正确地解决了继承自己民族文学艺术的优良传统的问题，我们的新文艺就将在广大人民中更深入地发展。”³文学艺术作品只有是人民群众所熟悉的，而且具有民族特性的才会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进行流传。此外还应注重创作语言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很大程度上是表现在文学作品的艺术语言上。”⁴群众的语言是丰富的和具有民族性的，发展适合于新中国的新文学艺术必须要在人民群众的语言宝库中汲取养料，才能使创作出的作品具有大众化的特点，只有这样创作的作品才能更加贴近人民群众，适合人民群众的心理和状态，才能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

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流传影响最大的应该属戏曲了。元代可以说是戏曲发展的高峰时期，直到“十七年”时期，戏曲对于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为什么戏曲这么的受人民群众所喜爱？其中不仅由于戏曲本身的艺术特色，更是由于它保持了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国现有的许多戏曲基本都是从民间戏曲发展而来，虽然有的一度成为宫廷戏，但是它的基础还是民间，善于将人民的生活作为创作的内容，善于使用人民的语言进行吟唱。因此，戏曲艺术不仅可以在古代作为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的艺术形式，就是反映人民群众的新生活也可以用戏曲来表现，但是由于戏曲在表现人民群众的新生活和斗争的时候，戏曲的形式与其要表现的内容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冲突，这就要求戏曲本身的创作和发展要具有民族特色，以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创作方向为指导，才能很好地解决旧形式和新内容之间的矛盾，因此在面对戏曲改革的时候不能够采取粗暴和急躁的态度。正如周扬在《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所说：“新的文学艺术是不能脱离民族的传统而发展的，只有当它正确地吸取了自己民族遗产的精华的时候，它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的。”⁵这也说明了新的文学艺术的发展是建立在旧的文学艺术遗产之上的，但是要采取正确的方法，不能采取粗暴的方法，更不能死守旧的规则而不改。对于其中的糟粕、消极的内容和形式当然要摒弃，但是其中能和新的内容相适应的形式要很好的继承和发扬起来。人民群众在几千年中养成的审美和欣赏习惯也是具有民族性特色的，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作品都是一些故事性很强的作品，但受

外国思想潮流的影响，文学艺术的创作逐渐向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转交，这其实是对中国新文艺的发展，但如果过于偏执，则会忽视人民群众的需求而远离人民群众，难以获得群众的认可。这一点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对赵树理的创作进行分析时，说得很明白。

“十七年”时期，民族化和大众化的文学实践是一项重要的文学活动。作家在创作的时候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和角度，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口味，对待旧事物要有批判性的眼光和态度，对待新事物要有敏锐的感觉。只有这样才能将新旧事物很好地衔接在一起，让人民群众能够很容易地接受，还能够很好地反映社会现实，产生对人民群众的鼓舞和教育作用。同时在文学艺术普及和提高的大方针下，不仅文学艺术家的创作向着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发展，而且工农群众自身也开始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活动。专业的文学艺术活动虽然取材于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具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在某些时期某些文学艺术家身上总是会出现脱离人民群众的现象。因此，发展业余工农兵的创作也是我们文学艺术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也能够积极地调动更广泛的力量进行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新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将专业和业余的创作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让文学艺术作品深入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但需要强调的是文学艺术家只有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坚持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才能创作出具有高思想高艺术质量的作品，体现社会主义新时代，成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三、总结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已经形成了丰富的民族特点在其中，而人民群众也非常习惯和适应这样的民族性特点。尤其是作为社会转型的“十七年”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更是面临的是“纵”与“横”的问题，“纵”的方面主要是需要面对几千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的的问题，“横”的方面主要是面对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问题，但周扬一直认为必须要坚持“民族性”来发展新文学艺术。由于周扬在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决定了他的文艺思想中具有民族性这一特点对于20世纪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十七年”时期文学创作的创作方法和创作立场方面。

注释：

- 1.周扬.《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187页.
- 2.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1960年9月4日《人民日报》,第5版.
- 3.周扬.《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
- 4.岳凯华.《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艺术实践——建国后十七年文艺创作一瞥》.《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81页.
- 5.周扬.《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

作者简介：

韩立平(1992-),男,汉族,安徽和县人,实习研究员,工作于国家开放大学,研究方向为文学基础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